

五大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历史视角的解释

——2016年现代经济史年会综述

郑姣姣

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它们当作未来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的指针。其中,创新发展揭示了如何激发新的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绿色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开放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揭示了如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此背景下,经济史研究领域也从历史视角展开了一系列探讨。

2016年5月21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五大发展理念与当代中国经济:历史视角的解释”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副所长朱恒鹏,贵州财经大学校长蔡绍洪以及来自全国相关研究领域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创新发展、历史角度下的城乡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经济史学研究、开放思想下的经济变迁、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反贫困历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创新:60年来自强发展的必由之路

创新发展针对的是全球科技与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与我国创新能力较弱的突出矛盾,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源泉问题,主要涉及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创新。一部分学者就这一主题研究了当代中国经济中正在进行或需要进行的创新之处。兰日旭从历史视角,以“市场、技术、组织”为切入点,梳理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程、发展动力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于文浩对比了中国和日本中小企业的状况,指出日本中小企业的创新驱动力一是来自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二是来自企业创新体系的构建保障,三是来自社会创新体系的构建保障,日本中小企业创新体系建设对中国企业有很大的启示。彤新春用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铁路产业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技术上实现了由模仿到突破创新的路径转换;在人力资源上,也已经形成了能够满足到世界各地完成施工、建设、运营全产业链所需的各种人才队伍。宋士云和吴连霞用史料分析了1979—1991年间中国企业劳动关系转型的起步,指出虽然这一时期国家尚未明确市场化改革,但一系列改革措施却表明,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非国营企业的企业劳动关系都有进行体制创新的趋势,显露出市场化的理念。

二、协调: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

协调发展针对的是经济总量高速增长与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突出矛盾,注重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协调发展的重点是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建国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

[作者简介] 郑姣姣,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贵州,550025,邮箱:xuyou0229@163.com。

施的户籍制度,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协调发展的理念下,农村问题、城乡关系问题也成为研究热点。对于农村问题,许多学者聚焦于农民进城和农村非农就业的问题。隋福利利用自1929年开始跨度约70年的对无锡、保定的自然村进行的抽样调查资料,从历史角度对农村非农就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周肖也对1949—1956年间农民进城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农民相对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进入城市就业或定居,而且当时的政府政策是有益于调节城乡经济平衡的。龚征旗和马浩峰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2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认为教育创新科技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必要前提。

此外,针对农村问题,很多学者还试图从历史角度研究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赵俊红研究了从农业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从劳动合作到集体化这段时期里,农村工分制的产生背景、具体形式、计算方式以及特征。易绵阳研究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劳动的“反行为”,即农村劳动中,普遍存在着农民集体劳动偷懒、不负责任、劳动力外调等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是导致当时农业生产率低下的主要因素,并指出生产队的监督不利和分配不公是导致当时农民劳动“反行为”的主要原因。徐峰研究了抗战时期,贵州省农村合作金融网的建立和农业的开发问题,并用史料证明战时贵州农村合作社贷款有利于缓解农村金融枯竭并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但后期农村合作金融开始衰弱。

三、绿色:从历史到未来的必然选择

绿色发展针对的是我国以往粗放型发展模式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突出矛盾,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绿色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是解决好人与自然的问题,处理好人口同资源的矛盾问题。瞿商和郭昶俊参考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基于人口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计划生育减少新增人口,与此同时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二者双管齐下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并迈入非马尔萨斯世界。刘明国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及其效果,并指出我国人口现状存在诸多问题,认为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均已进入“新常态”时期,人口政策应当以优化人口结构为目标。

除了人口问题外,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对此,张连辉梳理了1949—1978年这一时期农业植物保护和农药污染防治工作的政策和状况,从历史角度考察其特征、效果和主要影响因素。常明明梳理了土地改革中国家针对山林分配的政策,以及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纠纷和解决办法,认为从当时中央和各地颁布实施的山林分配办法来看,基本都是尽量分配给农民实行私有制,而不是尽量国有化,并指出明确山林产权才便于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对山林进行保护和管理。单晓娅和张冬梅认为目前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要想推动该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西部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评价指标,并以此来研究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情况,为其发展提供依据。

四、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开放发展针对的是全球局势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与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水平较低之间的突出矛盾,致力于推进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无疑能够为现阶段的对外开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因此,从历史角度研究我国对外开放和中国道路有重要的意义。杨帆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特点,把每30年划分为一个发展阶段,并重点总结1979—2009年期间的“第二个3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经验教训。姜长青通过对国民经济“六五计划”的研究,认为“六

五计划”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动力作用,也离不开对当时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放发展需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这方面,一些学者关注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张丽和王雪婷通过案例分析指出品牌效应也是国际不平等交换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认为这种品牌效应不仅包括商品自身的品牌,还包括国家品牌。张焕焕和王年咏通过对20世纪德国和日本先后经历严重内外冲突时所推行的一系列金融改革的研究,提出我国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规避内外冲突,需要借鉴德日两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经验。

五、共享: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

共享发展针对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追求以民富优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福祉,从而推动国家进一步发展。共享发展体现之一是城乡居民是否能够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赵学军利用从1929年开始的,对无锡、保定的自然村进行的跨越约70年的调查资料,分析了无锡、保定农户消费结构的变迁和城乡住户消费结构的差异,指出未来在共享发展的理念下,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将会趋同。朱高林通过一系列数据表明,虽然政府实行了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的政策措施,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了一些可喜的新变化,但居民收入差距缩小趋势的基础并不稳固,有进一步扩大的压力。实现共享发展还需要加速推进脱贫攻坚工程,解决好仍然存在的贫困问题。张琳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反贫困问题的研究。郑姣姣梳理了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再到十四届三中全会这三个阶段里我国政府针对贫困问题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对其进行了绩效分析和经验总结。

除以上五类主题研究成果外,王立胜分析指出新发展理念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必将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并将引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程霖和陈旭东通过对新中国经济增长思想发展变迁的系统梳理,指出我国经历了从外延式经济增长思想为主,到内涵式经济增长思想为主,再到现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思想的发展变迁,并研究了这一变迁过程中的特点以及变迁发生的原因。

(责任编辑:黄英伟)